

# 浮沉八十年 (三)

華壽崧

## 黨內分裂余師消極

民國三十六年這一年立法院根據憲法規定，制定國民大會組織法；各院組織法以及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選舉法，旋即舉辦各項選舉。各級黨部推薦各項選舉候選人名單，層轉中央核定。這時候全國競選的候選人羣集南京，爭取提名，奔走中央黨部、中央團部的真如過江之鯽。甚至不獲提名，而登報脫黨自由競選的大有人在，黨團本來不睦，此時更是火上加油，明爭暗鬥，鬧個不休。因派系鬥爭影響下層工作幹部更加分裂，無心對共產黨去積極鬥爭。余老師井塘先生從此消極，不願再幹黨政工作，但未公開表示而已。他曾對我說：

「假使我回國從事報業，盡我所知發表社論，可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偏偏介入黨政工作，害了自己也無補於國家社會。」

因此他不參加任何競選，他之參加教育團體國大代表競選，完全是于錫來兄一手安排的。

我個人參加寶應縣國民大會代表競選，得黨的支持與任職多年的教育局長家叔采之先生的號召，很順利的當選。

黨內分裂首先表現於副總統選舉，三十七年初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第一次大會選舉總統，以蔣中正領導抗戰獲得勝利的威望，為全國人民所

愛戴，當選第一任總統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李宗仁野心勃勃，也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他存心要做副總統，自認為蔣公的繼承人非他莫屬。在開國民大會前曾致函陳果夫先生請示蔣公允許他參加副總統競選。到了開大會以後，蔣公是屬意孫科先生為副總統。因為已答應李宗仁在前，不好明白的表示出來。暗中指示中央黨部要支持孫科，不料黨內同志程潛、于右任以及無黨派的莫德惠三位先生相繼參加競選，在這分歧複雜情形之下，一部份同志則策動兩湖的代表支持程潛，分散孫科的票源，其目的是扯組織部長陳立夫先生後腿，使他難堪，顯示黨的領導無方，因此在第一次投票時，使孫科的得票落在李宗仁之後。其後孫科的態度又似乎過於驕傲，認為他得黨的支持不會落選，而李宗仁的風度則謙虛備至，請黨員代表救援支持。到最後決選時，李宗仁竟以得票多數當選副總統。

黨內分裂第二度顯著的表現則為立法院副院長競選，孫科於競選副總統落選後，蔣公於就任總統後提名他為立法院院長候選人，黨內同志一致支持，很順利當選。孫科先生當選了立法院長，即提名陳立夫先生為副院長候選人，部份黨員、立法委員則表示反對，幾度秘密集會，決定不予支持。嗣蔣公知悉，兩次召集這幫委員剴切的告誡，要他們摒除成見，支持陳立夫先生當選，最

後陳先生以勉強的多數當選副院長。三十七年五月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就職之日，院長依法宣誓就職。而陳立夫先生則起立發言：「萬方有罪，罪在立夫。今天我來是向諸位辭職而不是就職的，我已辭去中央組織部長，從今以後再不過問黨政工作，請諸位另選賢能，繼替副院長任務。」嗣後就改選童冠賢先生為副院長。從此大家痛定思痛，不再有黨團磨擦現象，可惜時間太晚了。共產黨正在中原與政府作殊死戰爭，大局糜爛已不堪收拾。加之李宗仁咄咄逼人，倡言要和共產黨和談，逼得蔣公有不得不引退的趨勢。

陳立夫先生辭去中央組織部長及立法院副院長後即去美國參加道德重整會，一去不返。蔣公以總裁身份召見余井塘先生，要他繼任組織部長，余先生表示：「救國必先救黨。現在黨已支離破碎，我們服務黨工已二十年，真是黨的罪人。立夫同志不能負責整理，我更不能負責。」蔣公當即請問：「然則黨已亡了，無法可救嗎？」余先生答曰：「不然，同一個主義，同一個領袖，而有兩個組織，必然會發生衝突，黨團必須合併，而由第三者——忠於主義、忠於領袖的人，出來大力整理，把忠貞同志提拔起來；製造磨擦的人淘汰逐出，這個黨才有希望重振旗鼓領導革命。像我們這些人儘管本着客觀的態度去用人做事，別人總認為是主觀的，不好也不能負責整理黨

務，一新耳目。」總裁想了一想，繼續的說：「我一時找不出適當人選，你暫時代理部長如何？」余先生仍堅持不能應命，總裁又說：「你的話很有道理，今天留此午餐，好好再談下去。」余先生表示：「很抱歉，今天下午我的長女出嫁，有些家事亟待料理，不能陪總裁午餐。」隨即告辭。當天下午三時余先生長女葆齡與翁家驊先生在介壽堂舉行婚禮。吳秘書長鐵城先生趕來道賀，同時拉着余先生悄悄的說：「翁詠寬將出來組織第一任內閣，井塘兄擔任一席內閣部長如何？」余先生當即正色的答復：「我今天應總裁召見，所談內容鐵老想已聞悉，我的救黨淺見完全出於至誠，如果以退為進獵取官職，那我就不是余井塘了，知我者鐵老，請轉呈總裁，並謝謝您的美意。」等到婚禮完成後，余先生即出京避居杭州鄉村，臨行前留一封信給我，要我辭去組織部第一處副處長職務，就任內政部參事。當時內政部長是彭君匯先生，余先生事前已為我推薦給彭部長，並已獲同意。這時陳布雷請張道藩先生出來挽余先生代理組織部部務，張應邀去杭州一趟，回京報告布雷先生，說找不到余先生踪跡，可見余先生入山已深，辭意甚堅，請轉陳總裁，不必再予考慮，強其所難。總裁出於無奈，決定指派另一位副部長谷正鼎先生代理部務。

代理部長人選既已決定，主任秘書張清源先生要我去杭州找余先生回來，代表陳先生辦理移交，同時問我能不能找到余先生？我應聲回答：「應該找得到的」，我即去見余師母問余先生的踪跡，她說，如找到孫多慈夫人，當可找到余先生的住所。當天乘夜車往杭州，我先按址找到孫夫人，她以電話問余先生，南京來了一位華先生，你見不見他？余先生當即囑託孫夫人派汽車送我到他住的住所，見面以後，余先生首先問我，他出京後有何反應，我說祇是布雷先生有點抱怨余先生。他認為「您不繼任部長，還得再見面商量商量，何必離京出走。」余先生說：「我在京一天，就有人包圍我，要我留在組織部，更有人去包圍總裁如何如何。那我就擺脫不了哪。」我這時才報告他，總裁已決定谷副部長代理部長，請他回部替立夫先生辦理交代，他說：「好了，好了，今天下午我們就回南京。」他到上海，即下車往復旦訪章友三校長，謀一個教授。我逕行回京覆命，報告張主任秘書，說余先生明天就會回來辦理交代。余先生從此結束黨務工作，我也隨之去職，但未到內政部去報到，余先生認為奇怪，也沒對我說些什麼。

### 籌辦大剛報衡陽版

這時，徐蚌會戰失敗局勢天天惡化，南京正準備遷都廣州，李宗仁力主謀和，總統蔣公中正逼得讓位，退居奉化。我到上海送余先生登輪赴臺灣避難，他問我今後作何打算，我看他這樣消極，無意再追隨到臺灣開居，也不能累他為我操心，祇說：「想向西南方向走去，看看老朋友暫時謀生。」他即交付一封信給我，介紹我到粵漢鐵路見某局長，謀一職務。我即回京摒擋一切，準備攜眷逕赴衡陽，正巧立夫先生找我去衡陽籌辦大剛報分版，準備南京失守後將大剛報人員撤往衡陽，在衡陽復刊。我說我未辦過報，不能負這個重任，他說，你祇是籌備而已，等籌備就緒就讓你他去。至於籌備經費已囑溫社長子瑞即將滙來，衡陽市長蔣默揆先生也可隨時予以協助。那知我們到了衡陽，粵漢鐵路局長已換新人，帶來余先生推薦函也無可投遞。幸好蔣市長代我租了一幢房舍，作為大剛報籌備處可以安身。嗣後南京棄守，大剛報本社來衡陽的員工廿九人。一部運送新聞紙的卡車從安徽過境時，被土共搶劫一空。大剛報社祇運到對開機一部，鉛字、新聞紙全無，等了半年未見溫社長滙來分文，這二十九位員工的伙食由我私人墊款供給，直至六個月後程潛省主席已表明態度曖昧時，我內心焦急萬分，趕往廣州找到立夫先生說明籌備困難情形，立夫先生說溫子瑞報告他在上海滙過五千銀元給我，何以到現在還沒籌備完成。我說這完全是謊話，後來他找交通銀行總經理趙棟華先生查問究竟，趙先生說大剛報的存款祇有港幣七仟元折合銀元祇值八百元。在上海縱或有錢也無法滙往衡陽。因為上海使用銀元券，湖南省則使用銀元，那時銀元券天天貶值，如滙去銀元券不可能在湖南交付銀元的，立夫先生聽他話才恍然大悟。趙先生素知我的為人，也知道我這時進退兩難，提議將僅有的七仟港幣存款兌換八百銀元交給我，把大剛報人員遣散，立夫先生同意的意見辦理。我為了避免今後的紛擾，要求立夫先生寫一條子給我，說明交付八百餘元，以及遣散給資標準。我說：「大剛報這批人未嘗與我共過事，將來更不能共患難，我得立夫先生八百銀元，他們可能

疑惑我得了八千元，我也無可辯白，說不定選被他們辱罵。」立夫先生聽我陳述立即照辦。我回衡陽出示立夫先生手示，大家無話可說，各自領了錢紛紛離職他去。

### 逃難西南身陷虎口

三十八年夏季，白崇禧部隊撤退廣西，粵漢、湘桂鐵路盡作軍運；中央、中國民航空運又相繼投共，我一家八口陷在衡陽，動彈不得。嗣後搭上軍車到了柳州，休息一星期再搭車轉往貴陽。沿途訪問老友，都各作逃難準備，邊論招待我輩遠客。不得已再轉往遵義租屋暫住，喘息兩月探悉縣長即八期同學張君，承其過訪，其實是為打聽前線軍軍消息而來。後來重慶胡孝先同學（十五期）來遵義訪問張縣長，以家存鹽巴八萬餘擔，擬請縣長協助運銷遵義，張縣長知我賦閒，轉介胡孝先於我，託我負責推銷，其時黔北各縣正鬧鹽荒，我就租了店面掛起元大鹽號招牌，開始銷鹽，並分訪地方袍哥頭頭請予照拂。胡兄和我約定，每銷鹽巴一擔，給我佣金銀元兩角，不到四個月，竟將八萬擔鹽銷完，我得一千陸百銀元，頗為得濟。不久，貴陽吃緊，我又開始遷居重慶住在胡兄鹽倉庫裡。胡兄的父親認為我够義氣，把廿四萬銀元滙到重慶分文不少，招待我特別殷勤，將我應得的佣金兌成小金塊，便於保存攜帶。

胡孝先年少氣浮，他說政大三十七年鬧風潮就是他幹的，我問他，當時是不是被共黨份子所利用？他含糊其詞，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是他說：「誰有辦法，就跟誰跑」，可見他確是被共黨份子利用，而不自覺。到了十一月底共黨軍隊從南溫泉侵入重慶，我軍根本未予抵抗，事前政府調集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三個集團軍約有四十萬人都望風披靡，向西昌西竄，共軍唾手而佔領重慶，蔣公以總裁身份指揮軍隊已經失靈。加之銀元券貶值成了廢紙，軍隊領到紙幣買不到糧食，軍心渙散焉能不敗。最後我見立夫先生一面，他要我隨他離渝，我以一家八口不便任其離散，如能脫險再到臺灣最好，否則全家願意同生共死，留在重慶。我們就這樣分手慘別了。當共軍炮轟重慶時蔣公仍留在重慶，聽說他第二天早晨去白市驛時，公路上拋錨的汽車橫七豎八阻塞了交通，他老先生最後是步行到機場，乘飛機前往成都的。

十二月初共軍進了重慶舉行入城式。每一位共軍軍服破舊不堪，精神疲敝，據他們自己說國軍退得太快，日夜追趕不上，所以軍服也來不及換洗，他們休息了兩天，湧來隨軍政工人員萬餘人，首先成立大行政區，西南政府下設若干部，地方成立各個區公所開始調查戶口。舉凡地痞流氓一律拘捕集中黃沙溪鹽倉庫。地方士紳一時稱快，認為共黨大刀闊斧確有辦法。其實這批地痞流氓被集中後，共黨派幹部首先逐一詢問。調查那家有槍，那家有錢，並訓練這批地痞流氓如何鬥爭。不久就分區召開人民公審大會，揪出地方士紳一一鬥爭，被他們訓練的地痞流氓就是鬥爭幹部，社會人士從此開始認識共產的真面目，第一個被他們捕殺的是市黨部書記長吳人初同志。

### 攜子赴滬投奔自由

我在這時打算離開重慶，心想如能走到香港就能轉往臺灣，第一，如何取得路條；第二是順利買到船票；第三，避免共黨刁難及嚴密的盤問。

我先去區公所領取路條，書記請區長批示，而區長證在板壁上對書記說：「好了，你就發一張路條給華先生罷！」書記告訴我區長不識字，他能舉筆批示呢？這位書記就給我一張路條蓋上區公所條戳，第一關算是通過了；其次，我託新蜀報一位熟識的記者，買到八張船票直駛上海，第二關又通過了；再其次是如何避免共黨刁難及嚴密的檢查，我先打聽輪船在次日早晨八時起航，朝天門碼頭查驗最嚴，我在早晨雇了一隻小木船從黃沙溪上游順流而下，大約半小時，靠近輪船外擋利用繩梯八個人一個接着一個爬上輪船，正好輪船即將開航，共幹最好一次檢查祇是草草了事，並未加以盤問。等到八時準時開航，我們一家八口才放開行李在船邊走道上睡覺，安心的離開重慶。下水輪船，兩天就到達宜昌，在宜昌改換大輪船駛往上海。那知第四天到了九江輪船靠岸，船長宣布日間停駛，以後祇能夜航。我靈機一動，想起一位內弟馬君在九江電信局任工程師，現在不知是否仍然在職，就上岸去試訪，幸而能及時訪晤，他問我們今後的行止後，勸我把家眷留在九江，要我個人先去上海探聽路線，再接眷屬會合同行。

在九江聽得兩則新聞：一是共黨進軍之初，

接收九江政府及各公用機關均派有軍事特派員統治一切，這些人員的待遇高出一般公職人員若干倍，對國民政府遺留下的職員則加歧視，引起很大的不平，但在專制淫威的管理之下只好忍氣吞聲，不敢反抗。電報局竟有人出了主意，使共黨的軍事電報發不出去。原來發報員背後都站着一位監視員，看到發報人滴滴答答發出電報後，一簽字證明每一份電報都已發出。經過一個多月，中共中央未嘗收到江西省一份軍事電報，感覺奇怪就派員前來查問。所有軍事機關拿出電稿及監視人的簽證一一核對，並無訛誤。他們發生很大疑問，何以這些電報都未收到？找不出原由，最後把發報員逐一拷問才了解實情，緣於待遇不公，發報員故意把電線切斷，根本未將電報發出，嗣後電報局才改善一般待遇，對技術人員才加以重視。

另一則新聞則是九江大街小巷特別整齊清潔，據說共黨在每一街道設置若干清道夫，清道夫的薪給由沿街居戶分別負擔，而以米計算。他們的收入較諸一般幹部並不低微，而他們的工作則無時無刻的勤加清掃。其實他們就是特工，每戶出入口口都在他們監視之下，並有翔實的記錄，如有異動，一目了然，因此發生很大的鎮壓作用。共黨的特工如水銀注地無孔不入，他們組織力之強，於此可見一斑。

我遵從我內弟的意見，攜帶幼子昌平復登輪東去，把家眷留在九江，家父年高已七十多歲，他不願再同我們流浪，就在南京江岸分手，他獨自回到高郵，同老母去過艱難的生活，我們是在深

夜到達上海的，船上旅客祇有我們父子兩人，在靠岸前冒出一位同班同學韓廷爽兄，他告訴我他是河南被共黨通緝的犯人，逃到漢口，在漢口潛入船艙的，所以在船上並未露面，當輪船尚未靠近岸邊，他猛然一縱，跳上岸就逃去了，以後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我們父子等停泊好了，來了共黨公安人員對我盤問許多。有一人說上海正被臺灣飛機轟炸，你為何要來上海，要我隨船仍回重慶，我說我在沿途看報未見到上海被炸的消息，如果這是事實，重慶區公所也不會發路條給我。現在既然到了上海，先要籌一筆旅費才能回去，他最後問我在上海有什麼親友，我隨口亂說我認識交通大學校長，他們就把手一揮，准許我們上岸。我們父子二人登岸後，已是深夜二時，雇了一輛三輪貨車往北四川路訪問老友王理成兄。叩門後，相見時王兄至為驚訝，問所從來，將何所往，當以一年來逃難經過約略告之，希望即日赴港。據答往香港很容易，但須求助於駱美中兄，他原任中央合作金庫上海分庫經理兼中央信託局副局長，蓄意投共的，投共後並不得意，任華東貿易局一個閒職，他知道往香港來往的人很多，沿途注意事項一清二楚，他和我無怨無仇，過去他曾有求於我，我未嘗受過他的恩惠，我想他對我這位難友不會為難。待天明後，王理成兄即須赴華東貿易局接受大課（即洗腦課程），順便帶我去見駱美中，我們走到駱美中辦公室門口，理成兄指點我在他房間內可講私話。我就推門進去，美中見到我便舉起雙手，表示投降，我想他內心有虧，誤會我去刺殺他的，我也舉起雙手向他打

招呼，道出來意。他隨即教人代我買兩張聯運的火車票，直達香港，他並囑咐我到廣州車站後立即換票，乘廣九鐵路到香港尖沙嘴下車，廣九火車上沒有餐車，在石岐車站加水加煤時可下車進小館子喫叉燒飯，順便換二十塊港幣以便到港時零用，他對我的指示很明確周到，而且很有禮貌。我反問他為何不走，他答復我：「現在走不了哪。」語氣中帶有悔意。我拿到車票立即回到理成兄家中。他的嫂夫人亦即駐埃及大使王化成的夫人，同情我的遭遇，勸我父子洗個澡換下臭衣服，由她代我洗澡，用熨斗燙乾，她慨嘆的說：「歷代王者得天下，必定首先安民，共產黨偏偏要清算鬥爭，弄得雞犬不寧，人民失望，當上海初淪陷時人民興高采烈，扭秧歌、大遊行，大家認為今後可以安寧的度日。那知現在青年學生個個心灰意懶，都不願參加遊行，拒絕共產黨的誘惑。」當晚在大雪紛飛中，我們父子兩人即登車南下，車中旅客互不通話，鴉雀無聲。每列車有士兵兩人，常常來往掃地，蓋即特工之流藉掃地竊聽旅客語言，旅客多有戒心，故皆沉默寡言。路過衡陽，大雪停止，沿途白雪皚皚，木葉凋零，更顯得寂寞無奈。到次日中午，車抵廣州車站，旅客下車，才互相交談，都道出心曲，原來大家皆是赴港逃奔自由。於是互相支援搬運行李，換取車票，廣即換車直奔九龍，約莫晚十一時抵站。時值三十八年除夕，趕乘末班輪渡渡海，幸得兩修女用粵語代向海關人員關說，通過入境檢查，覓得旅舍就寢。因為脫了虎口與奮過度，反而不能成寐。（未完待續）